

本报记者 白佳丽

疫情在全球蔓延的这些日子，冯骥才被困在“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”的书房中，不断创作。采访那天，他笑称“掉进了时光隧道，竟不觉忘记了时间”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那些消逝的人、消逝的文化都被他一一封存在最新短篇小说集《俗世奇人（叁）》中。市井风情、音容笑貌，再回味仍在周遭。

肚子里这样的人物太多，就顺着笔墨自然而然进入笔底

草地：为什么续写《俗世奇人》？

冯骥才：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因为读者、出版社都希望我再继续写。《俗世奇人》的前两卷读者很多，内容也被选入国内外的教材中，如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就一直在用《俗世奇人》俄译本。

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这肚子里这样的人物太多了，而且这一套文本和语言我已经驾轻就熟，所以写起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我与其他作家还有些不一样，我在天津生活了70多年，在这里出生、工作，中间换了七八种工作，搬了10次家，所以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市井风情、百姓的性格、地方的文化特点，以及地方的风俗历史都太熟悉了。百姓的音容笑貌、脾气秉性都在我心里，所以写起来很快乐，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岁数大了，下去考察、调研一年减少到两三次，虽然对文化遗产、古村落还是放不下心，但像原来一样出差很长时间、各地跑，体力已经跟不上了，所以在书房的时间多了，写作时间也就多起来了。写起来很快，基本上两个月就写出来了。

草地：新的18个人物与过去的人物相比，有什么变与不变？

冯骥才：基本没有变。《俗世奇人》就是一篇盯住一个主要人物，然后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以及他的营生都与别人不同，每个故事和人物，身上的绝活都是特殊的，每个故事里的深意也都不同，但写法都是用一种语言。《俗世奇人》有我专门为它定制的笔墨，写《俗世奇人》时这样的笔墨就自然而然进入我的笔底了。

草地：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？

冯骥才：这套笔墨是自然的，也是我有意识的，不是书的地方语言我很熟悉，但这种语言是口头语言，不是书本语言。

我的语言有一点不同，就是要有天津特点。我的人物要有天津的集体性格，天津人性格热情、豪爽、幽默，喜欢调侃，甚至戏谑；天津人比较重义气，但是又逞强好胜、好面子；另外天津人还有朴实的一面。我要把这些性格写到小说的人物中，关键就是我的叙述语言要有天津特点。

草地：选入《俗世奇人》的人物有标准吗？



黄琳

疫情无情。玉兰花开了，这是春天，却在孤芳自赏中流逝。

躲在梭罗的森林里观赏雪听他讲蚂蚁大战和猎犬逐野猪的故事，并不只是找一处避开疫情巨浪的港湾，而是目睹永恒而鲜明的生命表达。

自然的意义，在于生命；而生命的希望，源于自然。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里，不曾出现这样的字句，梭罗从不定义大自然的含义，他只是把自己放进大自然里感受草木春秋鸟鸣兽奔的生命，那是全书的血脉。

梭罗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这是一本非大众读物的书。至少在我的周围，喜欢读书的一些朋友里，它不那么受欢迎。我曾刻意做过一个小调查，结果发现有四分之三的朋友拒绝亲近它，有的朋友礼貌地表达了对它的高山仰止，有的则干脆说自己不喜欢，不值一读。我的“读过”略等于翻过。陆续读过两次，一次就像到某地旅游，仿佛为了完成“我到过某地”的任务；另一次作为睡前读物，翻了“湖”那一章。多年来的若即若离，到如今如影随形，都找不到具体的理由。对这本书重新产生兴趣，很大的原因是我最近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生活，什么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？中年人迷茫于生活目标，不知道算不算正常？梭罗可是大学一毕业就尝试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从哈佛大学毕业后，他回到家乡康科德镇，在当地一所中学教书。他讲授的科学和自然史，古典名著等科目，得到学生的高度认可。徐迟的译者序里引用了一段资料：“梭罗老师讲课时，学生们都静静地听着，教室安静得连掉下一根针也能听见。”

教师的生活没有中断梭罗的探寻。和他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的哥哥约翰，也是梭罗探索自然的伙伴。1839年，22岁的梭罗和24岁的约翰驾着他们自己造的船，在8月的夏季，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做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航行。

这次美妙的河上航行被梭罗写进了自己的第一本书《河上一周》。写作的时间，正是梭罗住进瓦尔登湖小屋的那两年。那时约翰已因病去世，大病一场的梭罗在纽约小住后回到康科德，重新整理生活，并开始为爱默生购得的那一小块林中土地上搭建小木屋。

1845年7月4日，梭罗走进森林，开始瓦尔登湖畔两年的小木屋生活。

《瓦尔登湖》记录的，是一场为期两年的个人生活实验。避开人群进入森林，过一种与鸟兽为

说人解史

疫中“被困”书房的冯骥才，有所思

“一个地方最深刻的、最不可改变的还是人的性格，性格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，是一个地方独特的人文传统”

冯骥才：（笑）不是入选的人物，是什么好玩，我觉得非写不可，就写出来了。人物有几个特别好的细节，有特别打动我的东西，是特别的，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，而且能够表现出独特的精神来，有一定的深刻性。比如说《黑头》里的那条狗。天津狗的故事我知道得非常多，但我只写了这条狗，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细节觉得非常好。这个狗的故事，我听别人讲过，特别打动我，连天津的狗都有好面子的性格，不能给人找麻烦，也讲义气，有这样一个细节，这个小说就出来了。

草地：“小人物”为什么反而打动您？

冯骥才：我喜欢写普通人，这和天津文化有关系。北京是精英文化城市，上海是商业文化城市，天津不一样，是市井文化城市。天津人喜欢身边的能人，老百姓愿意讲身边的能人，也佩服身边的能人，他们是天津人生活中的榜样。这些人有能耐，靠本事吃饭，有很多天津人崇拜的性格。比如马三立，就是草根里出来的人物，很接地气。我写这样的小说，也是因为我在天津生活久了，受这种文化的影响。

草地：以后的作品中会不会有俗世中的新人？现代人？

冯骥才：我是写完《俗世奇人》之后觉得写作状态特别好，于是就写想写一些随笔，因为小说的思维和随笔完全不一样，随笔是写生活中有的东西，小说是写生活中没有的东西，好多人物是作家创作出来的。两个写法不一样、意义不一样。我坐在书房里想，写什么，不如就写写书房吧。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书房，作家的生活方式与别人不一样，一辈子都是在书房中工作，书房就是纯精神的世界，书房中没有锅碗瓢盆，有作家的历史、个性、爱好、精神、记忆，在书房中可以挖出大量的东西。我就在屋子里坐着，那几天就有点“神经质”了，看什么东西都会触动一下，比如姥姥的小花瓶就会让我想起很多相关的事情，包括内在的历史、社会变迁、文化、审美等等，各种想法，于是一口气就写下来了。

冯骥才：我是写完《俗世奇人》之后觉得写作状态特别好，于是就写想写一些随笔，因为小说的思维和随笔完全不一样，随笔是写生活中有的东西，小说是写生活中没有的东西，好多人物是作家创作出来的。两个写法不一样、意义不一样。

我坐在书房里想，写什么，不如就写写书房吧。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书房，作家的生活方式与别人不一样，一辈子都是在书房中工作，书房就是纯精神的世界，书房中没有锅碗瓢盆，有作家的历史、个性、爱好、精神、记忆，在书房中可以挖出大量的东西。我就在屋子里坐着，那几天就有点“神经质”了，看什么东西都会触动一下，比如姥姥的小花瓶就会让我想起很多相关的事情，包括内在的历史、社会变迁、文化、审美等等，各种想法，于是一口气就写下来了。

我觉得书房就是自己精神的空间，也是创作的空间，书房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是自己的，是随性的，没有任何布置的成分，却有一个人的性情。像天津的老作家孙犁先生，写了《白洋淀记事》，他的文字就干净透亮，人也很沉静。他的桌上只有一样东西，一个白瓷盆里，放了十几颗不同颜色、图案的雨花石，然后放上特别干净的水，他说每天都要把石头洗一遍，换一遍清水。他喜欢一尘不染，他的文字也一尘不染，没有一点世俗气。所以我觉得书房是一个作家的秘密。《书房一世界》就是作家把自己的秘密给读者看了。

冯骥才：我觉得没有，文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，它如果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地域的性格，那是很难改变的。你可以把房子给拆了，但是性格是很难改变的，比如天津人对市井生活、曲艺杂技很有兴趣，要生活得有滋有味。一个地方最深刻的、最不可改变的还是人的性格，性格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，是一个地方独特的人文传统，比如俄罗斯是战斗的

草地：这些年，天津人骨子里的劲儿有变化吗？

冯骥才：我觉得没有，文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，它如果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地域的性格，那是很难改变的。你可以把房子给拆了，但是性格是很难改变的，比如天津人对市井生活、曲艺杂技很有兴趣，要生活得有滋有味。一个地方最深刻的、最不可改变的还是人的性格，性格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，是一个地方独特的人文传统，比如俄罗斯是战斗的

草地：关于这本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？

冯骥才：写完后我看到书房里有一本冰心送

梭罗的“春天”：不死的大地，永恒的生长

“人类的生命即使绝灭，也绝灭不了根，那根上仍能茁生绿色的草叶，至于永恒。”

——梭罗

“人类的生命即使绝灭，也绝灭不了根，那根上仍能茁生绿色的草叶，至于永恒。”

梭罗此后终身没有从事一份固定的职业，行走自然，观察、记录成为他主要的工作，随身携带的物品包括一本日记簿、一支铅笔、一个显微镜、一把大折刀、一团麻线，和一本可以采集植物标本的旧乐谱。有时也戴着草帽，但鞋子必须结实，裤子以深色为主，方便随时爬树查看松鼠或云雀的窝，也让他更容易翻过矮榆树。

爱默生在《梭罗小传》里介绍：“他不肯为了任何狭隘的手艺或者职业放弃他在学问和行动上的抱负，他寻求一种更广阔的行业，生活的艺术……他从不虚度光阴或自我放纵，需要金钱时，他更喜欢通过一些适合他的手艺活来赚取，如修小船、搭篱笆、种植、嫁接、勘测，或其他短工，而不愿长期受雇于他人。由于他吃苦耐劳，需求甚少，又精通木工、擅长算术，所以他有能力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谋生。”（见王家新译《瓦尔登湖》）

用最少的时间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，梭罗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，却更忙碌。他在45年的有限生命里，留下了两本著作、200多万字的日记和书信，以及刊载于报刊的数篇文章。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思考和观察，陆续被后人整理成书，翻译成各种文字流传。

《瓦尔登湖》是本什么样的书？首先我想说，这是一本很薄的书，以徐迟老师的译本为例，全书不过292页，这还算上译者序和结束语，对于初识梭罗的人来说，一头一尾的介绍不可忽略。

越薄的书，越是难读，言简意赅不适合形容任何一本书。这本薄书，读来未必顺畅，尤其是第一次面对它的读者。就我自己的阅读体会看，难读的一个原因是引经据典多，东西方哲学典籍被梭罗随时拉进他的文字中，不够博学的读者难以跟上节奏。就像我们轻松地在湖边散步，途中突遇关卡，要猜对谜

“一个地方最深刻的、最不可改变的还是人的性格，性格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，是一个地方独特的人文传统”

冯骥才：（笑）不是入选的人物，是什么好玩，我觉得非写不可，就写出来了。人物有几个特别好的细节，有特别打动我的东西，是特别的，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，而且能够表现出独特的精神来，有一定的深刻性。比如说《黑头》里的那条狗。天津狗的故事我知道得非常多，但我只写了这条狗，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细节觉得非常好。这个狗的故事，我听别人讲过，特别打动我，连天津的狗都有好面子的性格，不能给人找麻烦，也讲义气，有这样一个细节，这个小说就出来了。

草地：“小人物”为什么反而打动您？

冯骥才：我喜欢写普通人，这和天津文化有关系。北京是精英文化城市，上海是商业文化城市，天津不一样，是市井文化城市。天津人喜欢身边的能人，老百姓愿意讲身边的能人，也佩服身边的能人，他们是天津人生活中的榜样。这些人有能耐，靠本事吃饭，有很多天津人崇拜的性格。比如马三立，就是草根里出来的人物，很接地气。我写这样的小说，也是因为我在天津生活久了，受这种文化的影响。

草地：以后的作品中会不会有俗世中的新人？现代人？

冯骥才：我是写完《俗世奇人》之后觉得写作状态特别好，于是就写想写一些随笔，因为小说的思维和随笔完全不一样，随笔是写生活中有的东西，小说是写生活中没有的东西，好多人物是作家创作出来的。两个写法不一样、意义不一样。

我坐在书房里想，写什么，不如就写写书房吧。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书房，作家的生活方式与别人不一样，一辈子都是在书房中工作，书房就是纯精神的世界，书房中没有锅碗瓢盆，有作家的历史、个性、爱好、精神、记忆，在书房中可以挖出大量的东西。我就在屋子里坐着，那几天就有点“神经质”了，看什么东西都会触动一下，比如姥姥的小花瓶就会让我想起很多相关的事情，包括内在的历史、社会变迁、文化、审美等等，各种想法，于是一口气就写下来了。

我觉得书房就是自己精神的空间，也是创作的空间，书房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是自己的，是随性的，没有任何布置的成分，却有一个人的性情。像天津的老作家孙犁先生，写了《白洋淀记事》，他的文字就干净透亮，人也很沉静。他的桌上只有一样东西，一个白瓷盆里，放了十几颗不同颜色、图案的雨花石，然后放上特别干净的水，他说每天都要把石头洗一遍，换一遍清水。他喜欢一尘不染，他的文字也一尘不染，没有一点世俗气。所以我觉得书房是一个作家的秘密。《书房一世界》就是作家把自己的秘密给读者看了。

冯骥才：我觉得没有，文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，它如果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地域的性格，那是很难改变的。你可以把房子给拆了，但是性格是很难改变的，比如天津人对市井生活、曲艺杂技很有兴趣，要生活得有滋有味。一个地方最深刻的、最不可改变的还是人的性格，性格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，是一个地方独特的人文传统，比如俄罗斯是战斗的

草地：这些年，天津人骨子里的劲儿有变化吗？

冯骥才：我觉得没有，文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，它如果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地域的性格，那是很难改变的。你可以把房子给拆了，但是性格是很难改变的，比如天津人对市井生活、曲艺杂技很有兴趣，要生活得有滋有味。一个地方最深刻的、最不可改变的还是人的性格，性格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，是一个地方独特的人文传统，比如俄罗斯是战斗的

草地：关于这本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？

冯骥才：写完后我看到书房里有一本冰心送

单地

冯骥才：我们在时代转换期的时候，有些东西不应该消逝，应该传承下来，一个民族要对自己好的东西有记忆。当一个社会物欲太强的时候，要提醒人们珍视我们祖先代代相传的一些美好传统，不要丢了它。

比如过年，包括年画、年文化的抢救。除夕放假就是我在两会上的提案，我认为除夕应该放假，中国人过年过的是大年三十，三十不放假怎么能把年准备得特别好。我们千万不能把“年”丢了，短信拜年我就很赞成，还有春运特别值得重视。要让老百姓的春运过程完美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文化、因为传统，让几亿人迁徙。当然还讲过很多次春晚，上世纪80年代我们很多传统习俗淡化后，春晚是电视人对春节的贡献。我们还建立了年文化基地，出版了大量关于年俗的书籍，都是为了把中国人的春节留住，春节现在是团结四海华人的节日。

草地：现在什么事情会激发您的创作欲望？

冯骥才：现在我就正在创作中。我觉得真正激发创作的还是积累，大量生活的积累，在一定的的时候会升华，让你感到生活的力量，以及生活本质的东西，发现生活的真谛，找到一些重要的东西需要告诉别人。

草地：写作是表达自己重要，还是传递给别人更重要？

冯骥才：没有内心的压力也写不出来，一定要把自己感受最强烈地表达出来。但是传递给别人也很重要，一定要考虑作品对别人的影响。一个作家对读者负责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要传达真理，给人生活的力量、信心和勇气。另外我又是一个画家，还要给读者以美感，不论是风景、人物，还是事物，要有很高的审美品质。

草地：您的作品能走出国界，被其他国家读者认同，原因在哪里？

冯骥才：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我们国家的、民族的文化特点，他们有兴趣；还有就是我们共同的东西，比如追求真善美的理念，会触动他们，有共鸣。

关于疫情：着急使不上劲的感觉

草地：关于疫情，您在思考什么？

冯骥才：目前我在创作中，所以一天只看3次关于外界的信息，每天早上醒来，我会先看看疫情的状况，包括大的走向、国外的情况，还有专家对于疫情的看法。目前我们也不知道病毒的特性到底是什么，将来以什么形式存在或者消失。还有我有关切医务人员，中国抗疫能够做得好，主要功臣就是医务人员。这次疫情上我也很着急，它和汶川地震不一样，地震之后是人类的刻不容缓，我向国家提出很多方案，包括建立北川博物馆等，并带着专家小组到了北川、汶川等地考察，在西北大学成立了专家工作基地。但是这次到不了前线，加上我年纪大了，他们也不让我出去，所以只能靠手机了解情况，有着着急使不上劲儿的感觉。

冯骥才：我没有什么变化，一直还是那样，就是现在岁数大了，出去调研变少了，仍然是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，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。

草地：为什么对将要消逝和已经消逝的东西特别着迷？

冯骥才：写完后我看到书房里有一本冰心送

谈一个苏格兰诗人和他的作品

演讲不成功，听众们碍于乡情，费了不少劲儿才忍住离开或昏睡的冲动，但也不愿委屈自己，所以在演讲结束后他们让梭罗有机会讲讲林中生活。

第二年的2月，梭罗以《我的个人经历》为题，再次给乡亲们做了一场演讲，受到热烈欢迎，听众们甚至邀请他继续就这个话题再开一次讲座。

演讲，在梭罗随后几年的生活中频频出现，为此准备的演讲稿也成为《瓦尔登湖》内容的雏形。

越过第一章的门槛后，后面的风景绵延不绝，太多美好的场面令人反复流连。可爱的、耐心的、细致的、好奇的、博学的……梭罗妙笔生花；文采斐然的背后，是饱含深情的梭罗。

他的世界如此美好，兴致勃勃、充满生气，他和他的邻居们徜徉湖边，啄木鸟、小松鼠、鸚鵡、野兔、猫头鹰、丁香花、桦树、松树……这些飞禽走兽、草木花果和他并肩林中，看日出日落、云聚云散。

“不须在山林的一些风景点上多久，便可以看见它的全体或轮流出来展览它们自己。”梭罗展示他的邻里之间，我满足地看他展示的生活。

但不限于此，梭罗从不做隐士，他是一个热心的观察家，对社会问题和现象的诸多批评散落于各处。

“村子”一章里记录了他到镇上补鞋的意外。1846年7月，他因为拒绝纳税，在镇上取补的鞋时被抓捕，关了一个晚上随即获释。

把“春天”放在最后一章，写春天到来前的各种琐事，河与湖的解冻，万物复苏的欣喜和生气，愉悦。梭罗用生物学解剖图一样的精准，记录下泥沙流下铁路陡坡的景象，他说那是比春天更春天的诗歌：这是一片有机的土地，仍然继续生长。

不死的大地，永恒的生长，是梭罗认为的“春天”。在这个认知下，看众生平等，时光流逝，伤春悲秋也会从容。“人类的生命即使绝灭，也绝灭不了根，那根上仍能茁生绿色的草叶，至于永恒。”

——再次回到梭罗写这本书的目的：“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，可我要像破晓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，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。”

我和朋友说，梭罗的文字不须用来理解，不用读懂，感受就好，全神贯注感受，会有激荡，也会云深不知处。

“植物一跃而起，花朵怒放，和风吹拂……”春天来了。梭罗说，阳光如此温暖，坏人也会回头。